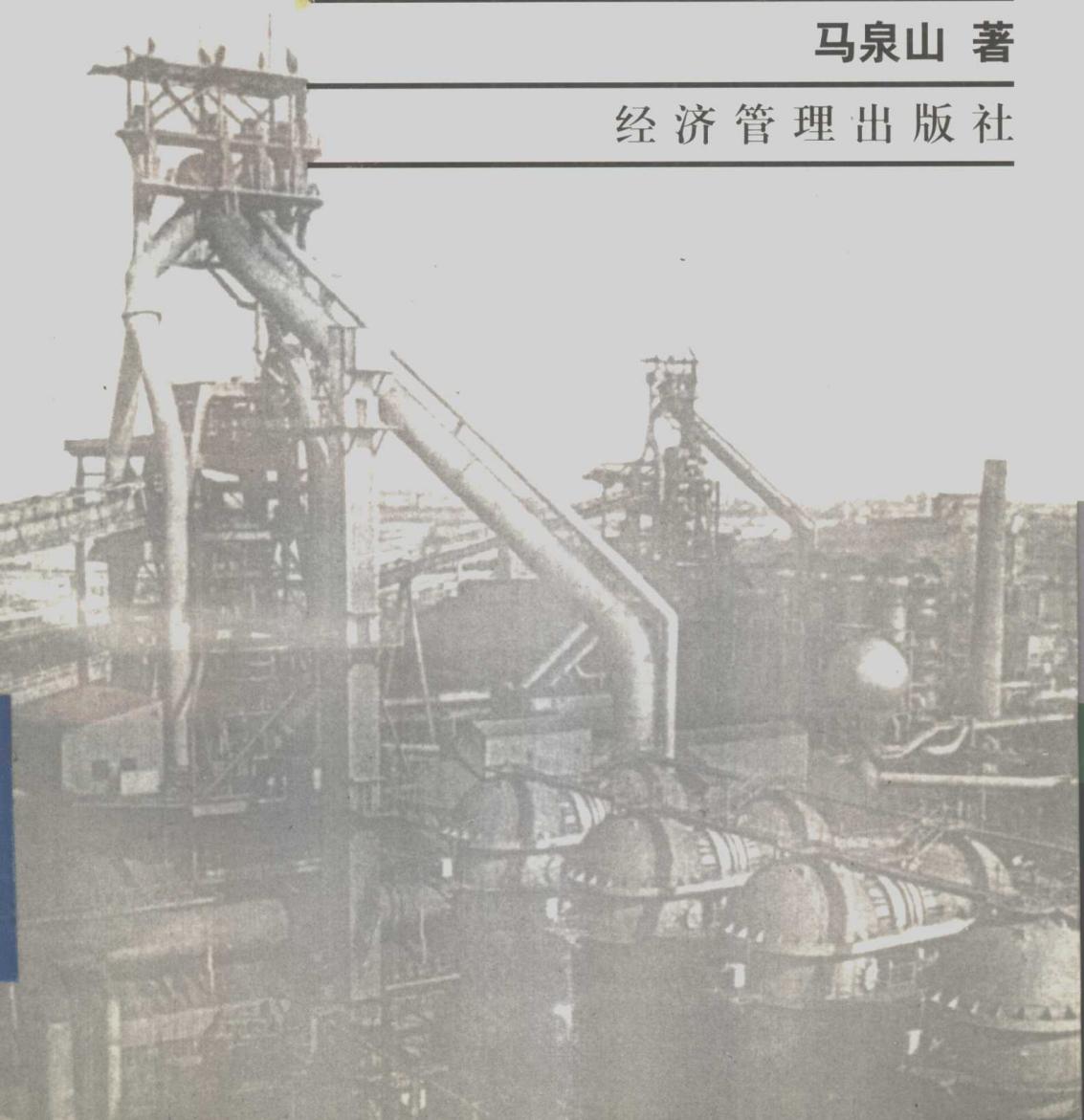


新中国 工业经济史 (1966 -1978)

马鞍山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1966~1978)**

马泉山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责任编辑 林道君
版式设计 蒋 方
责任校对 孟赤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马泉山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ISBN 7-80118-646-X

I . 新… II . 马… III . 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66～1978
IV . F42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7049 号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1966～1978)

马泉山 著

出版：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新街口六条红园胡同 8 号 邮编：100035)

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总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

850×1168 毫米 1/32 18.25 印张 471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18-646-X/F · 618

定价：2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地址：北京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邮编：100836)



作者简介

马泉山，河南省禹州市人，1935年生，1950年参加工作。曾在县、区和地区工作。1954年转入工业部门。1956~196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外交学院、外交部工作。“文革”中曾下放干校劳动，之后在工厂生活工作近十年。1980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工作。现为研究员。作者多篇内部报告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有《我国国营工业企业扩权的界限应该在哪里》、《我国企业领导制度的实践经验与改革趋势》、《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经济建设方针政策简论》（与李鑫合著）、《毛泽东的独特视角：农业就是工业》、《完整把握邓小平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互相兼容的思想》等。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的院科研重点课题四卷本《新中国工业经济史》中的一卷。该课题由汪海波负责主持；汪海波、吕政、马泉山（均为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等共同承担；汪海波、吕政担任主编。

工业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

由我所研究员马泉山同志撰写的理论专著《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是我所汪海波研究员承担主持的我院重点课题《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部分研究成果。它以专著的形式，系统地阐述这段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较为特殊的时期，目前国内尚无此段专卷，一般当代中国工业史、经济史著作涉及这一时期亦较简略，该项研究成果应当认为是一个重要补充。这本专著的主要特点是：充分考虑了工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阶段性特点；突出了这一时期工业经济发展积极的一面；注意了工业经济史的叙述和工业经济运行过程的叙述的结合；对“三线”工业建设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全书结构严谨，资料丰富，可读性强，是一本治学严肃的学术著作，对我们了解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全貌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

该书凝结了作者在这一领域多年的辛勤劳动和研究成果，此本专著的出版不会引起著作权的争议，我们建议给予资助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 陈佳贵
工业经济研究所

1997年4月8日

专家推荐意见之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马洪：

看了马泉山同志撰写的《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书稿（初稿），觉得它既是当代中国经济史著作，也不妨视为研究1966～1978年间中国工业的学术专著。据我所知，目前国内已出版的一些当代中国经济史著作，关于这一时段的叙述常使人有语焉不详的感觉。马泉山的此著若能出版，将是有助益的。

书稿所述时期，主要是1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但作者不以“文化大革命”起始分期，而将下限延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者的理由是，工业经济史的分期应首先满足经济史的学科要求。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不足以表示中国工业发展的划时期的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不同。以这次会议为起点，中国开始按照“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重新部署经济工作，着手改变工业发展战略，根本改革工业经济管理体制，前后两个时期显著区别开来，遂使1966～1978年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这是一种新的分期方法。

确定1966～1978年间的中国工业经济史以符合实际的叙述主线，我认为这是作者的一项新的研究成果。按作者的概括，就是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临严峻国际环境与“文化大革命”内乱的特殊困难复杂的局势中，继续领导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围绕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目标，推进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并在艰难曲折中取得一定进展为叙

述主线。作者为此提出，应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和它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继续努力的实践活动适当加以区分。不能因为有上述左倾严重错误，就看不到它继续为建立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努力的一面，中国工业仍继续发展着的一面。作者这一立论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论证，但试图对这一时期中国工业何以能在“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中继续获得发展的矛盾现象作出解释，从而把自己确定的叙述主线放在使人信服的基础上，却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这也是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作者这种探索精神，正是科学研究所需要的。

在书稿的许多章节，都能使人感到作者努力把当代中国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与现实经济问题相对接而又不以今日之政策论断昨日之是非，总是把叙述的问题摆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具体分析，引出结论。关于“三线”工业建设是具有代表性的章节。作者把这一战略举措放在彼时的国际大环境中进行考察，再现了作出备战与“三线”工业建设决策的历史根据，以及在实施这一决策过程中又怎样努力才能兼顾国家安全考虑与经济效益考虑这两个侧面。既基本肯定这一历史行动的合理性，又分析了它的严重浪费和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作者在这里把“三线”工业建设同时看作是对落后地区的工业开发与经济开发过程。这是据以基本肯定“三线”工业建设的又一个立足点。作者由此认为，在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对备战方针和“三线”建设部署进行调整后，工作不应松气，更不应停顿，只可量力而行地进行。后来没有很好进行下去，成为一篇“没有做完的文章”。这可能比某些具体项目的缺点失误损失更大。但是，作者归根到底认为，“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的效率与效益损失，也类似于马克思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作者说，经济史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

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一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犹如人类为预防灾害损失，而需要额外支付一部分经济资源，用于兴建公共工程或设施一样。它虽然是社会劳动的扣除，然而却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期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在这一点上，“三线”建设中的一部分效率、效益损失是暂时性的，与纯粹为预防灾害而垫付的那一部分成本又是不同的，同纯粹的军费开支也是不同的。作者这一观点，颇有新意。

总之，这部书稿的成书有自己的思路和见解，而且构思比较严谨，是一部认真的学术著作，建议给予资助，使之顺利出版。

1997年3月25日

专家推荐意见之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佳贵：

马泉山同志的《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书稿，是我院科研重点项目《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第3卷。与前两卷比较，该卷增设了关于工业经济运行状态及结果分析的章节，尝试把工业经济史的分析与工业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互相结合起来。这一努力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这也正是目前国内当代中国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近年来，关于工业经济增长过程及结构演进过程的研究比较活跃，但在同工业经济史的研究相结合的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当代中国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吸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马泉山的这部书稿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框架设计与内容安排上尽可能兼顾这两个方面。例如第一至六章在对工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分析后，接着便在七至九章对工业经济的运行过程进行分析。这一部分包括工业增长分析（第七章）、工业结构演进分析（第八章）和工业增长成果分享状况的分析（第九章）。其他各章的叙述，也注意二者的结合。书中使用了大量统计数字，设计表格较多，反映了这一特点。

在工业经济史的分析与工业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的结合上，并不是没有困难的。作者关于经济史的史学性质并非就是经济自身运行过程的历史性质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在作者看来，作为经济史著作，它要求在叙述任何一个问题时，都应如实地把研究对象摆到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在这一点上，较多表现的是它的史学性质；然而，没有经济分析的

经济史是不可思议的，而经济分析尤其是成本收益分析，总是要求把非经济因素加以排除，方能计量并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作者据此认为，历史评价与经济评价往往存在着矛盾，作为经济史，应承担起处理好这种矛盾关系的使命，努力结合二者，作出自己的评价。该书稿在牵涉到所述时期内的许多重大问题（如“三线”工业建设、开发江南煤田等），进行叙述分析和加以评述时，都努力遵循这一方法论原则，提出颇多引人思考的看法，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该卷结构上的另一特点，是增设了工业姊妹产业的章节。作者把农业、运输业、物资商业、对外贸易和科技教育等与工业关联度较高的部门称为工业姊妹产业，从产业链的角度纳入工业经济史体系予以研究叙述，但又不等同于国民经济史的叙述分析。这是一个可贵的尝试。作者的构思处理将有助于积累这方面的经验。

1966年至1978年间的工业经济史研究，是有难度的，资料的收集也比较困难。从成书情况看，作者作了很大的努力，治学态度是严肃的。我认为，这个书稿基本上达到了该项目的要求，特郑重推荐出版，并向院申请出版补贴。

1997年3月31日

前　　言

本书是汪海波、吕政担任主编的四卷本《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第三卷，也是汪海波、俞恒、马泉山、吕政合著一卷本《新中国工业经济史》“‘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业经济”一篇的扩充和深化。由于本书的相对独立性质，构思和撰写完全由作者负责，故有几点需要说明。

一、关于分期问题

在“一卷本”里，是按“文化大革命”时期分期，其时限为1966年至1976年10月。本卷的上限仍以1966年为起始，下限则由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延伸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这样的改变，主要是考虑了经济史的要求。中国政府原来确定，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的第一步，是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即从1966年至1980年的15年里，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①如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进行分期，从政治史的角度看亦无不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转折意义；而对于工业经济史来说，却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它并没有改变政府的上述总体部署。以1978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分期，情形就不同了。（1）这次全会后，中国政府开始对工业和国民经济进行新的调整，实际上改变了原定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任务，1979年和1980年的整个经济工作都按照“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重新安排。（2）与此同时，根据全会关于必须对中国权力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439页。

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精神，开始了其最终目标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虽然正式提出和明确确立这一目标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它的起点则是这次会议。从这一认识出发，将1966～1978年视为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应是合理的。

二、关于叙述主线问题

在确定分期之后，有必要就本卷的叙述主线，即以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这一时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继续为推进国家工业化积极奋斗，并在艰难曲折中取得一定进展的历史进程为叙述主线的问题，加以讨论。“一卷本”的相应部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业经济”一篇，关于这一问题的处理，限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以及集体著述中的认识差异，不尽如人意。本书有责任弥补这一缺陷。毋庸讳言，这里存在着不小的困难。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中，有人试图通过从“文化大革命”本身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必要区别中寻找解决类似困难的办法。这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作为经济史著作，谨慎地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与它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继续努力的实践活动适当加以区分，是完全必要的。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分析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这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所以，上述决议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又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

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① 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审视这一时期的中国工业经济史，就不会因为中国共产党犯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左”倾严重错误而看不到它领导自己的人民为继续建立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奋斗的一面，也不会因为有“文化大革命”内乱的干扰破坏而忽视中国工业生产建设在总体上仍然获得了一定进展的事实；相反，它将有助于说明客观上存在的如下的矛盾现象，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困难时期仍旧能够被继续向前推进，尽管没有可能取得应有的更大的进展。

三、关于全书结构问题

作为经济史的史学性质与作为经济运行过程的历史性质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作为经济史著作，它必须把叙述的对象如实地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叙述，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就经济论经济，无法说明经济史。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总是就它的总趋势而言，按经济规律办事在许多情况下也不能不带有终极的性质，而非完全亦步亦趋。理想化的境界也许只存在于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外因素是异常复杂的。但是，经济史同样表明，经济规律归根到底又是不可能长期违拗的。所以，经济史著作不能仅有编年史的叙述而没有经济分析。尝试将工业经济史的叙述分析与工业经济运行过程的叙述分析结合起来，溶历史评价与经济评价于一体，从上述结合与衔接中把握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将是本书努力的目标之一。为此目的，在全书结构上增设了关于工业经济运行过程叙述分析的章节，普遍充实了经济分析的份量。作者自知非本人力所能及，只想提出问题，期待实践的检验与识者的批评。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第22、28~29页。

本书的结构设计，拟划分为以下几个板块：

引言部分主要对本卷所述时期的国内外环境进行概述，为全书展示一个大致的背景。

第一章至第六章，是对 1966~1978 年政府工业发展政策及其实施过程和工业经济曲折发展历程的叙述。

第七章至第九章，是对这一时期工业经济自身运行过程及其结果的叙述分析，包括工业增长的叙述分析（第七章）、结构演进的叙述分析（第八章）和增长成果分享状况的叙述分析（第九章）。如果说前六章较多地显示着史学的品格，那末这三章则更多地表现了经济学的特征，比较着重于经济分析。

第十章至第十五章，是分别就建立中国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若干重大举措的叙述分析。

第十六章是按工业部门进行的叙述分析。

第十七章是对工业姊妹产业的叙述分析。

工业经济史关于工业姊妹产业章节的设计，不能仅限于农业、运输业，还应该写流通、写科技教育部门的意见，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同志提出来的。作者对此深表赞同，欣然接受。遗憾的是欠缺这方面的知识，资料又较少，没有完成好这一任务。

四、关于备战方针与“三线”工业建设问题

备战的方针与“三线”工业建设，是 1966~1978 年间中国工业经济史上不同寻常的重大事件。它对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重的，研究者见仁见智。原因之一，在于历史评价与经济评价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能否将这两方面适当结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评价，是本书尝试探索解决的又一个问题。在处理方法上，既把它放在一定的背景下再现其历史的根据，又摆在工业经济运动过程中进行效率效益分析。在六七十年代，在中美苏新的战略关系尚未形成的时候，中国领导人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作出这一选择的理由是不难理解的。然而，历史的发展终于没有出

现他们所担心的那种情况。这是否是一种浪费？从纯经济观点看，这样提出问题是顺理成章的。但作为经济史著作，本书则取分析态度。读过马克思有关著作的人想必记得，马克思在谈到分配问题时，将人类为应付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视为必要扣除的范畴。^①在当今世界，一国人民出于自卫需要的开支，虽然不完全像人类防御自然灾害一样，但在避免或减少经济（当然不限于经济）损失，以及在损失发生时能够给予相当补偿的意义上，则有些类似。从社会范围看，包括军费开支在内的广义的国家安全支出，都应视为社会再生产的成本费用，从而是纳税人的分摊部分，并最终计入任何一件产品或一项劳务的财务成本之中。

五、关于这一时期统计数据的可靠性问题

1966～1978年，中国的统计工作受到严重干扰；1967～1969年，国家一级的综合统计工作几乎完全停顿。1970年5月开始恢复部分主要的定期统计报表制度，1971年秋才决定完全恢复国民经济基本报表制度。这就产生了统计数字的可信程度问题。对此，曾任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同志，在他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过专门说明。在这篇文章里，他在扼要回顾并介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统计工作的状况，以及对所缺数字的补报核实情况以后，负责地告诉人们：“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②根据文中所说情况，“十年内乱中，国家级综合统计中断了三年，其余七年还是大体坚持了基本数字的统计；在国家级综合统计中断的三年当中，不少部门、地区、单位并没有中断，仍然收集和保存了不少重要的统计资料”。^③文中所说的部门，包括银行、财政、税收系统，铁道、交通、邮电系统，商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19页。

② ③ 《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粮食、外贸系统等，尤其是银行各级机构的数字，既较完整，又较准确。企业只要生产，一般也保存了若干原始记录或帐册。

本书统计数字及所述内容，不包括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划以当时情况为准。

本书使用了现今出版的当代中国史料（包括回忆录、口述史料等）和统计调查资料，以及当代中国经济史类的论著。一般在第一次引用时注明出处，多次引用时则不再一一注明。借此机会，谨向有关的作者、编者和出版界朋友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限于作者识见所限及掌握资料的不足，本书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敬希批评指正。

马泉山

1997年4月28日